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中国通史教程

主编 姜义华

第一卷

先秦两汉时期

本卷主编 刘泽华



博
学
·
史
学
系
列

复旦大学出版社



ISBN 7-309-04797-4



9 787309 047974 >

K · 170 定价：38.00元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中国通史教程

主编 姜义华

第一卷

先秦两汉时期

本卷主编 刘泽华

本卷编撰 陈 雍 朱凤瀚

赵伯雄 刘泽华

葛剑雄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教程. 第1卷, 先秦两汉时期/姜义华主编; 刘泽华本卷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1
ISBN 7-309-04797-4

I. 中… II. ①姜…②刘… III. ①中国-通史-高等学校-教材
②中国-古代史-先秦秦汉时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4976 号

中国通史教程 第一卷 先秦两汉时期

姜义华 主编 刘泽华 本卷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吴仁杰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31.5 插页 2

字 数 532 千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 100

书 号 ISBN 7-309-04797-4/K·170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通史教程

姜义华 主编

第一卷

先秦两汉时期

刘泽华 主编

第二卷

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

冻国栋 主编

第三卷

元明清时期

陈支平 陈春声 主编

第四卷

中华民国时期

张宪文 主编

第五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姜义华 主编

责任编辑 吴仁杰
封面设计 孙曙



作者简介

姜义华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章太炎思想研究》、《理性缺位的启蒙》、《中华文化读本》、《史学导论》等。

刘泽华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的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等。

陈 雍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研究员。代表作有《半坡文化彩陶鱼纹分类系统》、《姜寨聚落再检讨》、《横阵排墓葬再检讨》等。

朱凤瀚 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古代中国青铜器》、《先秦史研究概要》等。

赵伯雄 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春秋学史》等。

葛剑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移民史》第一和第二卷、《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等。

内 容 提 要

本教程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编撰。

重点撰述如下历史过程：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和各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和外部世界联系的形成与发展。这一叙述逻辑贯通全书，系统地表达了对中国历史进程问题的创新性思考。

本教程在各有关问题上力求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基本完整地把握了传世的与出土的历史资料及其基础研究背景，大量吸收或讨论了相关领域前沿研究的积极成果。在此前提下，各卷作者以其长期研究积累，分别阐述了立论明确、论证规范的独到见解。

第一卷《先秦两汉时期》撰述的中国历史演进过程，自中华族群、酋邦和中华古代文明的孕育与萌芽阶段，至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和大一统的中华古代文明的确立阶段。在系统表达中，本卷对先秦、秦汉史上重要问题展开了若干专题及个案研究，提供了一些具有新的认识价值或方法论意义的探索性成果。

《中国通史教程》几个问题的说明

姜义华

随着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以及为反对外国列强灭亡中国的军事征服而进行的民族战争一一结束,普遍的社会冲突与全面的社会激荡让位于经济与社会稳定持续的发展,整个国家转入以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历史研究的重点很自然地原先关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转到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先前各个世代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生产力总和,什么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精神的文化的及制度化了的各种资源。因为由一代又一代传承与积累而形成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历史资源,既会为新一代所改变,同时,也预先就规定了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以及它们的活动的特殊性质。现实是历史演变的结果,现实世界到处都包含着历史基因的影响。完整而深入地了解漫漫的历史进程,可以使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更为深刻,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编撰中国通史的使命。

鉴于我国高等学校所使用的中国通史教材,大多编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推进高等学校中国通史教学内容的改革,提高中国历史教学质量,1994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决定组织编撰中国通史新教材。当年11月10日,高等教育司发出通知,确定了本书主编及各分卷主编人选,并初步商定了编撰计划和出版单位。稍后,该司又确定由张岂之教授负责,另编一部中国通史教材,希望两部教材各有特色,供高等学校选择使用。现在,十年已过去,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历史》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而我们这部却迟迟未能问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着手编撰后,我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要写成一部真正具有新义的中国通史,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有太多的问题仍待深入研究。

通贯本书的“一贯之道”

众多前贤一再说得很清楚,通史的灵魂就在于“通”,除去贯通古今的“纵通”之外,还有汇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众多层面的“横通”。先前广泛使用的中国通史著作,将“纵通”与“横通”提纲挈领地融而为一者,多用所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或“历史进化发展内在法则”。然而,究竟何者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如何在中国历史演进中体现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考虑如何贯通与汇通时,不敢以为已把握或能够准确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只希望扼要而简洁地说明,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中华民族如何历史地形成,他们在不同世代如何利用历史形成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一边承继先前世代已形成的传统,一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旧的环境,从而使历史的中国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国,使历史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华文明。

基于此,本书的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生活在现今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世世代代生息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部族、民族结合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今天的中国人经由漫长岁月的种族混合、人口迁徙、社会变迁演进而成,不同历史时代,人们具有不尽相同的体态特征、社会文化秉性。除去精英人物外,特别是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默默无闻地创造了先前各世代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他们的历史主动性与创造精神,在历史变迁中经常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尤其值得注意。中国人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汉族是现今 56 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大的族群,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与贬低蒙、藏、维、回、满、壮等其他众多民族的地位与贡献。就汉族而言,也曾历史进程中融合了众多部族、民族。自远古时代以来,生息在东亚大陆的各个族群彼此间建立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血缘的广泛联系,发生过多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共同开发了从黄河到长江,从黑龙江到珠江的广大河山,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因此,本书努力将构成现今中华民族的 56 个民族共同作为中国发展的主体,考察悠久辉煌的中国历史如何由他们共同创造。

其二,作为国家形态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现今中国,在历史上本是若干分别以自我为中心的地域性、区域性联系的政治实体,它们由于共同利益、共同需要而一步步发展为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起密切的全国性联系。“天下大势”虽然被说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其后,纵使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分裂割据,却未能改变追求与维护国家统一这一强国传统。近代以来,中国虽屡遭列强欺凌宰割,经历一次又一次瓜分风潮与国土沦丧,但经过全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又不可动摇地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为此,本书将中国的国家联系、国家认同、国家制度及政治秩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作为考察的一个重点。

其三,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包含中华物质文明、中华精神文明、中华制度文明,包含中华各民族、各地域各具特色、各有其独特贡献的文化,包含早先的农耕文明、游牧—草原文明与山林文明,以及近代工业文明,包含按时间发展顺序依次形成的早期华夏文明、汉唐文明、蒙元文明、明清文明以及近现代中华文明等。考察中华文明,不仅要考察人们物质的及精神的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考察人们各层面的社会联系、社会结构、社会变迁,而且要考察人们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创立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成文及非成文的制度,还有各种习俗、秩序,以及人们日常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抒情方式、行为方式。先前,人们很少关注生产的目的是消费,由此,也很少关注现实生活的生产。本书力求据此全过程、立体化地展现中华文明的全貌。

其四,中国的世界性联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互相交往、互相摩擦、互相渗透,从而共生共存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双向乃至多向的长时段的曲折运动。就全球而言,真正的世界联系是随着以西方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创建而开始的;但是,此前具有始发性与原创性的几大古代文明早就互相接触,互相影响,而在这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经历了漫长岁月而从未中断的文明,也是面对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创建的世界联系,既勇于开放又坚持自强不息地实现着自身创造性转化的文明,它有力地推动着既朝着全球化方向前进,又保持各不同文明广阔的多元发展空间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因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本书又一重点。

我们深知,一部通史教材,无论篇幅多大,所能说明的问题总是非常有限的。它代替不了各种断代史、专门史、专题史,各种各样的地方史志和人

物传记。我们希望通过上述基本线索或称“一贯之道”，为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一种思路，一种思考框架，一种认识方法。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传统的划分方法，大体以中央王朝的盛衰兴替为标志，形成所谓“王朝体系”。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出现了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等阶段的划分，或分成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更化等阶段。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后，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历史分期在不少学者那里转变成以社会经济形态更迭为依据。然而，在人类发展史上，究竟存在过哪些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其社会经济形态及更迭的程序是否相同，更具体一些，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推进，是不是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地域。对于中国说来，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社会是不是东方式的奴隶社会，由地主—佃农经济与自耕农经济构成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不是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即使对这些问题都作了肯定性的回答，那么，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取代前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如此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从未取得令人普遍信服的共同结论。关于基本前提的意见已极难统一，历史分期便很自然地各执一说。仅以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时间而论，就有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东汉封建说、新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南北朝封建说等不同的主张，时间先后相差一千六七百年，每一说都振振有词。而所有这些主张，其实几乎都是据中央王朝情况立论，忽视了今日中国版图内中央王朝以外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对于中央王朝内部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也缺乏足够的估计。分歧如此之大，固然有资料发掘及资料诠释问题，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当是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推进的理论本身还很不完善，有待作出新的概括与总结。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没有采用根据王朝兴替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没有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等时间概念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也没有径直按照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来划分历史时期。由于本书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中

国和中国人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过程上,特别是作为族类形态的中国、作为地理与国家形态的中国、作为文明形态的中国、作为世界联系中的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上,便以由这四个方面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质的飞跃与转变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

以此,本书将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第一,中华族群、中华酋邦、中华古代文明与文化孕育与萌芽阶段。时间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 20 世纪左右。在今日中国版图内广袤大地上,由血缘性原始群团、氏族、部落逐步组合成一批较大的族群,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西戎集团、三苗集团、南蛮集团等,开始形成了具有政治管理性质的酋邦。由于石制工具的进步,他们由采集与渔猎经济发展到开始农耕与游牧,创造了丰富的原始文化。

第二,中华族群、中华早期国家、中华古代文明基本架构形成阶段。时间从公元前 20 世纪前后到公元前 3 世纪中期。夏族、商族、周族相继崛起,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各族联系扩大而频繁,使中华族群趋同性、内聚力增强;出现了一大批区域性初期国家,它们在相互交往、冲突、兼并、同化过程中,逐步形成春秋、战国时代的领土相当广大的诸侯国,它们名义上拥戴一个共主,相互建成各类不同的政治联盟,开始趋向建成统一国家。农耕经济范围扩大,北方游牧经济、西南山林农业经济都有了一定发展,在它们相互之间广泛的碰撞、互补与融合过程中,中华古代文明的基本架构和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逐步确立。

第三,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与大一统的中华古代文明确立阶段,也是今日中国版图内尚未纳入上述统一国家治内的各民族所建立的区域性邦国获得显著发展时期。时间从公元前 3 世纪晚期至公元 3 世纪初。秦汉王朝的疆域西部已达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部达朝鲜半岛中部,西南达到云贵高原及缅甸,南部达到了越南中部,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主体此时已大体确定,也就是说,地域的中国的主体这时已经形成。就族类的中国而言,这时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字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心理素质的汉族已经形成,原戎、蛮、狄、夷诸族这时也发展为西域、匈奴、西南夷诸族,与汉族的联系更为广泛而密切。就国家形态、文明形态的中国而言,由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控制与协调体制的建立,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大一统格局也逐步确立。

以上三个历史时期,为本书撰述的第一卷。

第四,在新的民族混合与重组基础上,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中

华文明辉煌发展阶段。时间从3世纪初至13世纪中。这一阶段开始时,东汉王朝分裂为魏、蜀、吴三国,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匈奴、氐、羌、鲜卑等族入居内地,在激烈冲突中形成新的民族融合。隋、唐在这一基础上重建了大一统国家,毗邻的南诏、吐蕃、突厥等族也进一步强大。稍后又出现了一段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终于逐步形成宋、辽、金、夏、于阗、大理、吐蕃并峙的局面。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农业文明经过近千年新的大碰撞、大融合,以及同印度文明、中亚西亚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华文明以及中华国家体制都获得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中华文明光芒四射,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二卷。

第五,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和中华古代文明普遍发展与局部更化阶段。时间从13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叶。推动历史进入本阶段的,是蒙古族的崛起与强大,它引发了欧亚大陆空前广大范围内的民族流动与人口迁徙,促成族类的新的组合;由于蒙古高原游牧文明一度取代农耕文明而占据支配地位,给原先中原大地的农耕文明造成巨大损害,但是,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发达,开始在原先农耕经济体制内形成一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经济力量。其后,经过明王朝、蒙古及乌斯藏的新的磨合,至清王朝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包含现今全部版图在内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已经稳定地确立。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林农业文明仍呈三足鼎立之势,农耕文明更臻成熟,但是,初期工业化和商业文明已经有了不可忽视的长足发展。中国与欧陆文明的关系,在起伏曲折的发展中已产生多方面联系。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三卷。

第六,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开始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转型阶段。时间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一阶段,中国一方面面临着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先前从未遇到过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殖民扩张的冲击。中华民族在空前危机与共同奋斗中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在新崛起的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始向现代民族转变。国家形态终于结束了已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体制,开始向现代国家体制转变。由于新型工业文明的诞生与成长,传统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但是,所有这些转变都仍在进行之中,无论在时间范围内还是在空间范围内,距离转变的完成还很遥远。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四卷。

第七,在空前广泛而直接的世界联系中,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

重新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经由众多曲折和全国范围的反复试验,寻得符合中国实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全方位转型。时间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中华文明凭借质的升华而重振雄风,生机蓬勃地跻身于世界现代文明之林。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五卷。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过程表明,历史上不同部族、民族每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冲突、混合、同化、重构,都非常有力地打破了中国今日版图内原先居民血缘的、地域的乃至部族、民族的封闭性,推动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促进了新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中华各族人民是中国历史的共同创造者。各族人民为缔造中华国家与中华文明作出了他们各自独特的贡献,尽管这一进程并不都是和平,其中不乏许多战争、征服与屠戮,仍无损于他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过程还表明,国家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同时又是进行社会控制与社会协调的有效体系,是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正因为如此,作为国家形态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表明,历史的中国尽管经常为剥削阶级所控制,但是除去维护剥削者的特殊利益外,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还在于它在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们生活实际中,对纷繁复杂的经常相互冲突的各方有效地进行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协调,有力地提供了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保障。除去政策上的措施外,其活力更源于制度上的、体制上的、机制上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文明的创造,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创造,包含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构建。自从阶级产生以后,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经常都是在阶级对立的关系中进行。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如此,制度生产也是如此。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经常不免要烙上阶级冲突的烙印。但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表明,任何一种生产过程得以有效地进行,在阶级存在的历史阶段,不仅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离不开对立阶级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妥协、乃至一定条件下的互相合作。在一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稳定发展时期,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最终是以不使生产方式破裂为限度,这时,实际上同一性是主要的,斗争性则是次要的。只有当一种旧的生产方式已经濒临崩溃,将不可避免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时,斗争性方是绝对的,同一性才转为相对的。

中国历史发展诸阶段又表明,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建立以后,人类

历史方才开始全面超越先前的区域史而真正成为世界史。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和外部世界发生过多种多样的联系,包含和平的交往与非和平的冲突,中国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中吸取了养料,也对世界其他文明提供了自己的创造性贡献。近代以来,中国先是被动地,后来则是主动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要了解世界,不能不了解中国;同样,要深入地了解中国,又不能不了解世界。

以上就是我们综合族类形态的中国、国家形态的中国、文明形态的中国、世界联系中的中国这四个方面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全过程所作出的阶段划分。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充实内容并使之更为精确。

中国历史中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

社会经济形态及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核心概念。列宁在他的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为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通过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人们就易于从各种社会现象中发现它们的重复性和常规性,进而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①。

然而,人类究竟经历了哪一些社会经济形态,中国历史又究竟经历了哪一些社会经济形态,中外史学界乃至整个理论界,迄今仍众说纷纭。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中国、苏联、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环绕着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经历了奴隶制时代,东方奴隶制或普遍奴隶制一说能否成立,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是否应称作封建社会,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是否无一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等问题,学术界的争论延续了差不多四分之三个世纪。这些问题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人们仍将不可能对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与更迭达成共识。

马克思毕生都在研究历史。早年,他偏重于西欧史、印度史;晚年,他重点研究人类史前史及俄国史、东方史。他不仅创立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0页。

这一学说,更通过自己的实践,昭示了应当如何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要确定人类历史究竟经历了哪些社会经济形态,应当像马克思本人那样对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关系作具体的分析,对各民族、各地域、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作出比马克思所处时代更加全面而深入的专门研究,再从中寻绎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普遍性结论。这是因为今天已经有了马克思生前尚未具备的资料条件与研究基础。如果不是这样做,而是将马克思当年根据对于一部分民族、一部分地域及一部分时代的研究作出的结论或大体的构想当成铁的法则,强行将其他民族、其他地域、其他时代的历史纳入现成的框架,那将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是给了他过多的荣誉,同时,也是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学说过分的亵渎与污辱。

社会经济形态问题,首先是人们究竟怎样生产,究竟使用什么生产工具、什么样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①

列宁在论述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时,也强调指出: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念,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②

马克思与列宁这里所说的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以及将社会关系最终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都突出了生产力发展水准在界定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时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正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准,将人类历史上社会形态的演进概括为三个阶段。他说: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4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页。